

钱端升先生和他的老师

谈火生*

钱端升先生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之一”，既有的研究对于钱先生的学术思想、社会交往以及他对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的贡献等问题多有论述，但是，关于钱先生的学术渊源和师承关系则鲜有涉及。目前仅见潘惠祥先生在《钱端升的美国政治学背景析论》一文中分析了钱端升学术思想与美国政治学中的德国传统之间的联系，并着重强调了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洛厄尔对钱先生的影响，指出洛厄尔对“活动着的政府”实践的重视是钱先生比较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是其热衷政论的重要理据，因为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各种批评和建议，所追踪和针对的对象就是“活动着的政府”。^①比较可惜的是，可能是由于材料方面的原因，潘惠祥先生对钱端升在哈佛时的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何尔康教授（Arthur Norman Holcombe）一笔带过，没有做具体的分析，使我们失去了从师承关系角度深入了解钱先生学术思想的机会。

本文即试图弥补这一缺憾，通过对何尔康教授的介绍，解析钱端升先生学术思想的渊源。尽管在钱端升留学哈佛期间，何尔康的名气没有威尔逊、布赖斯、洛厄尔等人那么大，但何尔康亦非泛泛之辈，其时他正担任哈佛大学政府系系主任，后来又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在美国政治学界还是很有影响的。关键在于，作为钱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在与钱先生的密切

* 谈火生，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① 潘惠祥：《钱端升的美国政治学背景析论》，《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交往中，他对钱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可能是包括洛厄尔在内的这些顶尖学者所无法比拟的。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来介绍何尔康教授及其对钱端升学术思想的影响：一、何尔康教授的生平；二、何尔康对钱端升先生学术研究的影响；三、何尔康教授的中国情结。

一、何尔康教授生平

何尔康教授生于 1884 年，卒于 1977 年，非常高寿。他曾经担任过哈佛大学政府系的系主任。1909 年从哈佛大学取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他留在哈佛大学政府系任教。何尔康教授的生平经历非常简单，基本上是在政学两界游走，当然，主要是在学界。在 60 岁之前，何尔康教授三次出仕，加起来不过 7 年时间，而且都是在战争期间，由于国家需要挺身而出，为国服务。战争结束后，他马上又回到校园，继续自己的学术研究。

何尔康教授第一次从政是在“一战”后期，他加入刚刚成立的国家效率局(U.S. Bureau of Efficiency)。国家效率局于 1916 年由国会成立，是最早的中央工作机构之一，它同时为国会和总统服务，主要从事政策分析和政策咨询。^①何尔康作为政治学教授，于 1917 年间被延揽入阁，战争结束后的次年他就回到校园。

何尔康教授第二次从政是在 1936 年，这一次他进入了位居权力核心的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ttee o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同年，他还担任了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主席。

何尔康教授第三次从政是在“二战”后期，珍珠港事件之后，他出任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The War Production Board)的上诉委员会主席，直到“二战”结束。

除了这 7 年外，何尔康教授一直在美国的各大名校任教。他先后任教的学校包括哈佛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斯坦福大学、密歇根大学、麻

^① Newbold, Stephanie P., "Lessons Learned from Revisiting the Past: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U.S. Bureau of Efficiency and the Office of Government Report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Vol. 68, Iss. 4, 2008.

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大学，1955年在哈佛大学荣休。荣休后，何尔康教授担任联合国和平组织问题研究委员会（Commission to Study the Organization of Peace）主席一职长达十年之久（1955—1964）。

俗话说，名师出高徒。何尔康教授有几个学生很有名。第一位是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美国第35任总统。第二位是亨利·艾尔弗雷德·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美国前国务卿、世界著名外交家。这两位都赫赫有名，无须介绍。有意思的是，钱端升先生在哈佛任教时也教过基辛格，因此，1971年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曾向周总理提出来要见他的老师，但是最后由于政治原因未能见到。^①

何尔康教授的第三位有名的学生是小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 Jr.），此人尽管没有前面两位有名，但也是美国历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他是美国有名的政治领袖，同时也是一名外交家。他曾经在1961年作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参选，后来在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时扮演重要角色。作为外交家，他曾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也曾多次出任美国驻外大使。

二、何尔康对钱端升学术旨趣的影响

作为钱端升的博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何尔康对钱端升先生的学术旨趣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是方法论，第二是治学理念。

1. 在方法论上，注重历史研究和制度研究，不轻易使用量化方法。

在钱先生的著作中，我们很少看到他使用计量研究方法。在其名著《中国政府与政治》中，没有一个表格。众所周知，是书出版之时（1950），计量方法在美国如日中天。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钱先生终其一生都非常注重历史研究，他特别强调历史研究对政治学研究的重要性。他不仅主持编撰了

^① 陈文秋：《钱端升先生年谱简编》，见赵宝煦等编：《钱端升先生纪念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9页。但是，在陈夏红编撰的年谱长编中没有记载此事，长编在该年仅记一条——“钱端升已经在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上班”。见陈夏红编撰：《钱端升先生年谱长编》（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65页。

《中国政制史》，而且翻译了 60 余万字的《英国史》，在“文革”期间还计划写作世界史。

计量研究是美国政治学最突出的特点，而注重历史研究则是欧洲的传统。钱先生在美国留学期间（1919—1924），恰好是美国政治学转型的时期。1880 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政治学院是美国政治学的发端，这一时期美国政治学主要是受德国国家学的影响，特别重视哲学、历史、制度研究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作用。包括哈佛大学在内，政治学最初是和历史学放在一起的，直到 1913 年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才从历史与政治系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科系，就是今天的政府系。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美国政治学研究的中心转移到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的特点是强调量化研究，引入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等方法，这成为日后美国政治学的主流传统。1921 年，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发表《政治学研究的现状》一文，被视为政治科学运动开始的标志。^① 就在前一年，钱端升刚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转入政府系学习。

按理说，钱先生进入政治学这个领域之初，正好赶上了美国政治学的转型，他应该是比较容易受其影响的。但是，我们从钱先生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他受这一风气的影响是比较小的。究其原因，本文认为这与何尔康教授对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为什么这么讲呢？1935 年，何尔康教授受中华民国教育部聘请，在中央大学等校任教。在此期间，他在全国各地做了系列演讲。1935 年 5 月 31 日，何尔康参观了定县的平民教育实验，非常兴奋，他说这是他在中国几个月以来所看到的最激动人心的社会实验。6 月 1 日，何尔康教授应邀做了题为《政治的实验》的即兴演讲，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他对政治学的看法。他认为“政治学不是科学，而是一种艺术”，科学方法在政治上运用非常困难。^② 时至 1935 年，以量化研究为代表的科学方法在美国政治学中已取得长足的发展。对此，即将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何尔康不可能不清楚，但他是反对这一趋势的。他认为政治上的实验“比自然科学的实验困难复杂得多”，因为“政治组织根本比自然科学复杂，因自然科学可用‘试

① 谈火生：《政治学的学科传统之争与中国政治学的未来》，《教学与研究》2017 年第 5 期。

② 《何尔康谓政治学是一种艺术》，《民间》（北平）第 2 卷第 3 期，1935 年。

错’方法，任何单位在相同的情形下作相同的试验必得相同的效果，而政治实验的单位是活生生的一个个的人，他要受环境的支配，不能用‘试错’的方法”。^①

我们只要比较一下钱端升先生回国不久所写的《政治学》一文，就可以发现何尔康的这一观点对钱先生的影响。1925年12月3日，钱端升在清华大学大学普通科演讲，对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了简要的描述。他在演讲中认为 political science “此名尚不及中文‘政治学’三字之妥当”，原因之一在于“政治学是否为‘science’尚属问题”。在他看来，“欲求政治成为科学甚难”。因为就研究对象而言，政治现象和物理现象不一样，政治研究的是人而不是物，“科学可以试验而得结果，然政治之现状非同气压或重力可比，吾人无法可使之就范而作吾人之试验”；就研究方法而言，“研究科学须用客观眼光，而政治学则往往用主观眼光，发表个人意见，此为科学所最忌”。^② 钱先生此处的论述与其老师所言何其相似！尽管他承认“政治学距科学尚远”，但是，他对政治学能否成为科学保持开放的态度，在这一点上，他比他老师的态度软化一些。

在此次演讲中，钱先生还特别强调欧陆政治学和美国政治学的差别。他说欧陆注重组织和制度，美国则侧重于行政和政事。他对于当时美国政治学的走向做过评论，他说，美国近年来政治学“竟作市政之研究”，这是“舍本逐末”。^③ 据此，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政治学研究方法上，何尔康教授对钱先生的影响非常之大，他们都秉持着老制度主义的研究路径，把它作为自己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2. 在治学理念上，何尔康教授和钱先生高度相似。

(1) 师徒二人均注重比较政治研究和本国政治研究之间的互动，在比较的视野中深化本国政治研究，以本国政治研究为基础开拓比较政治研究的新境界。

何尔康教授和钱先生的博士论文都聚焦于比较政治。何尔康的博士论文

① 《何尔康谓政治学是一种艺术》，《民间》（北平）第2卷第3期，1935年。

② 钱端升：《政治的学问》，钱元强编，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20年版，第4—5页。

③ 钱端升：《政治的学问》，钱元强编，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2020年版，第10—12页。

考察的是欧洲大陆电报事业的公有制^①，而钱先生的博士论文关注的是议会委员会，他把欧洲三国的议会委员会和美国的议会委员会进行了比较^②。可以说，师徒二人进入学界所迈的第一道门槛都是比较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后来学术生涯的基本方向。而且，他们在迈入这道门槛时所使用的方法都是旧制度主义的制度研究。不仅如此，他们在研究主题上都非常接近，甚至有重合。例如，何尔康教授曾研究过德国的宪法和德国革命^③；钱先生也写过德国的政府，他还特别强调，《德国的政府》这本书他是很得意的，该书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可能是他写的著作里面比较有价值的^④。另外，何尔康教授在战后担任联合国和平组织问题研究委员会主席一职长达10年之久，特别强调世界和平对于世界改造的重大意义。无独有偶，钱先生写过《战后世界之改造》等著作。^⑤可以说，在战后世界秩序的重构问题上，师徒二人心心相通，相互影响。

在钱先生所生活的时代，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危难之时，他显然不具备其师所享有的优渥的学术环境。因此，比较政治的研究对于他们师徒二人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对于何尔康教授而言，比较政治研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学术上的探索精神的自然延展，以之深化本国政治研究的冲动并不是很强烈。但是，对于钱先生而言，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更多是为了深化对本国政治的理解，并为改善本国政治服务。因此，在钱端升身上，我们看到他投入了大量精力在本国政治研究上，并取得了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学术成

① Holcombe, Arthur N., *Public Ownership of Telephones on the Continent of Europ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1.

② Ch'ien, Tuan-sheng, *Parliamentary Committees: A Study in Comparative Governm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British House of Common, American Congress, French Chamber of Deputies and German Reichstag*,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24.

③ Holcombe, Arthur 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German Commonwealth*, Boston: World Peace Foundation, 1919; Bouton, Stephen Miles, *And The Kaiser Abdicates: The German Revolution 1918-1919*, translated by William Bennett Munro & Arthur N. Holcombe, New Haven, Connecticu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1.

④ 钱端升:《德国的政府》，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⑤ 钱端升:《战后世界之改造》，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此书后来多次再版。

果，其名著《中国政府与政治》至今仍是西方人了解中国政治的必读书目^①，《民国政制史》详细介绍1911—1936年民国政治制度的设置和沿革，“只客观地叙述变迁经过，分析法制要点，而不参以赞否之意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②。

更为重要的是，在钱先生那里，比较政治研究和本国政治研究具有高度的关联性。一方面，他研究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研究比较宪法，最终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的政府和政治，并为中国的立宪提供借鉴。另一方面，他非常自觉地用英文写作，在西方世界为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辩护。例如，1942年，他在美国政治学的权威期刊《美国政治学评论》撰了《论中国的战时体制》一文，向西方介绍中国战时体制及其合理性。^③相比较而言，在其老师何尔康教授那里，这种关联就没有如此显著，他的两本关于本国政治的著作——《美国的州政府》和《美国政治中的中产阶级》^④，与其比较政治领域的研究主题之间并无明显的关联。

(2) 师徒二人均注重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之间的平衡。与后来学科高度分化之后的情形不同，尽管何尔康教授和钱端升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比较政治和本国政治，但是，他们在政治理论方面也颇为留意。何尔康教授在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验政治理论，而且是当时比较前沿的政党理论、代议制政府理论，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先后出版了《当代政党》《计划民主政体中的政府》和《行动中的政治：代议制政府的问题》等著作。^⑤钱先

① Ch'ien, Tuan-sheng,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China*,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② 钱端升等：《民国政制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

③ Ch'ien, Tuan-sheng, "War-time Government in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36, Iss. 5, 1942.

④ Holcombe, Arthur N., *State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16; Holcombe, Arthur N., *The Middle Classes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前一本书初版于1916年,100年后的2017年,这本书作为“经典”重印,此足以证明何尔康教授在这一研究领域的地位。

⑤ Holcombe, Arthur N., *The Political Parties of Toda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24; Holcombe, Arthur N., *Government in a Planned Democrac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35; *Politics in Action: the Problems of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 1943.

生在政治理论方面用力不是很多，而且主要集中在规范政治理论。他曾研究过英国 17 世纪的政治思想家詹姆斯·哈林顿，其《哈林吞政治思想的研究》一文首先是以英文发表的，后来以中文发表在《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① 1931 年，钱先生应商务印书馆之邀，选注英文政治学经典著作，选编了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马基雅维利的《霸术》、孟德斯鸠的《法意》和布赖斯的《近代平民政治》。^② “文革”前夕，从 1962 年到 1966 年，钱先生受命主编《当代西方政治学文选》，由他拟定文选提纲，从 60 多位西方著名学者的著作中择其要旨，译成中文，并配以介绍性文字，共计 150 余万字。可惜的是，书稿在“文革”中散失了。^③

(3) 师徒二人均具有明确而自觉的学科意识。何尔康教授和钱先生都生活在各自国家政治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他们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学科关怀，自觉地思考学科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关注特定的研究领域。就在何尔康教授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的那一年，他出版了《美国的政治科学》，考察学科发展的历史和现状。^④ 而钱先生学成回国之时，正是中国政治学的发轫之际，他积极参与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不仅花大量的时间向学界介绍国际上政治学发展的最新动态和各种最新的政治学著作，而且积极推动政治学学科制度建设。钱先生是中国政治学会的 45 位发起人之一，也是中国现代行政学的开创者。他于 1935 年在南京中央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创设的行政研究室，开启了中国现代行政学的研究。在改革开放之后，钱先生对中国政治学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推动了政治学学科的恢复，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构想。^⑤ 1980 年中国政治学会成立，钱先生被选为名誉会长。

(4) 师徒二人都横跨政学两界，将学者和士人这两种身份融为一体。何尔康教授在其职业生涯中，除了有 7 年时间在行政部门供职外，其余时间都是在大学里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而且，他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行政工作打

① 钱端升：《哈林吞政治思想的研究》，《国立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 1 卷第 4 期，1930 年 12 月。

② 钱元强编撰：《钱端升学术年谱简编（1900—1990）》，见本书。

③ 钱元强编撰：《钱端升学术年谱简编（1900—1990）》，见本书。

④ Holcombe, Arthur 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36.

⑤ 钱端升：《开展政治学研究的意义》，见中国政治学会《政治与政治科学》编辑委员会编：《政治与政治科学》，群众出版社 1981 年版；《为我国政治学发展进言》，《政治学研究》1986 年第 1 期。

成一片，学术研究为行政工作提供理论支撑，行政经验为学术研究注入灵感。钱先生亦是如此，游走于政学两界，相互滋养。具体的情况在此不赘述，本文只想指出一点：他们进入政界的时机，均是国家危难之际。前文已述，何尔康教授三次出仕，均在战争期间。钱先生参与政治，也是在抗日战争的危难关头。1934年，他接替罗隆基担任《益世报》主笔，宣传抗战；1937年，七七事变后，钱先生受国民政府派遣，和胡适、张忠绂一起，以非官方身份赴欧美宣传抗战，争取欧美在舆论和物质上对中国的支持；回国后，他又发起并主编《今日评论》，“一护抗战到底，二筹战后建设”。其拳拳报国之心令人感佩！

三、何尔康教授的中国情结

何尔康教授有很深的中国情结，他曾两次来华^①，并出版过两本关于中国的著作。

何尔康教授两次来华，一次是1928年，一次是1935年。^②1927年底到1928年春，何尔康教授到中国来的时候，钱先生陪同他去见了宋子文、杨杏佛等国民党要员，他们都是哈佛校友。^③这应该是他第一次来华。可惜的是，关于这一次中国行的情况，笔者没有查到相关的资料记载。但是，何尔康教授第二次中国行的资料非常详细，从他1935年1月来到中国，到8月份左右

① 1935年5月，何尔康教授在北平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本人前曾来华多次，惟此次则系受中国政府教育部之聘请，以便在各地国立大学中轮流演讲”。参见《何尔康到平 美政治学专家 在清华北大平大讲学》，《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5月8日。但是，同样是在1935年，他在《重游中国的感想》一文中又明确地说：“七年前，曾经到中国游历一次，今年是第二次。”何尔康：《重游中国的感想》，《中央周报》第362期，1935年，第44—47页。两处说法有冲突，根据既有材料，何尔康来华两次的说法较为可信。

② 据网络上的资料说何尔康教授1949年帮助蒋介石制定宪法。这个讲法不太靠谱，因为国民党在1949年并没有立宪活动。或者，这可能是一个笔误，误将1946写成了1949。如果何尔康确实曾经帮助蒋介石制定宪法，则其时间应该是1946年。但是，此事笔者没有看到正式的材料，不敢妄断，暂且存疑。不过，何尔康教授在1946年确实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制宪的学术论文。Holcombe, Arthur N.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and the Proposed New Constitutio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8, No. 1, 1946.

③ 钱元强编撰：《钱端升学术年谱简编（1900—1990）》，见本书。此事在陈夏红编撰的年谱长编中没有记载。

离开，其行程都有非常详细的公开报道。

何尔康教授的第二次中国行是受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聘请，在中央大学等国立大学担任兼职教授。^① 这一段时间钱先生也刚刚辞去《益世报》主笔的职务，在中央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因此，这段时间钱先生和他的老师算是同事。但是，关于钱先生和他老师在这段时间交往的情况，笔者没有查到直接材料。何尔康教授在中国的8个月时间里，跑了至少16个省份，足迹踏遍了半个中国：南方包括整个长江中下游，北方到了东北。当时关于何教授在中国的活动报道很详细，至少有两次关于他爬山的报道。^②

根据相关报道统计，何尔康教授在8个月中做了几十场演讲。从他在中央大学演讲的题目中可以看到，其系列演讲的内容既有当时国人关心的国际时事，如美国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态度；也有纯粹的理论问题，如宪政的理论与实施。^③ 据《国立中央大学日刊》的报道，当时来听演讲的，不仅有学校的师生，而且有政府的官员。听演讲是凭票入场的，而来要票的“多为各机关重要职员，尤以立法院为最多”。^④ 这可能也是后来民国政府立宪时聘请他当顾问的原因之一。

1930年，何尔康出版了两本关于中国革命的著作。其中，《中国的革命》系专著，全书400余页，共分十章。前面四章回顾了中国士人统治传统和清朝的覆亡，后面六章分析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以及由此展开的军阀混战、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训政和五权宪法。^⑤ 在当时这是一本非常有分量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学术专著，迟至201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又将其重印。

另外一本是《中国革命的精神》，这本书是根据何尔康教授1928年访华回国后做的系列讲座整理而成，以人物为中心向美国人介绍当时中国的精神面貌，每个方面选取一个代表性人物。例如，以孙中山来代表中国的民主精

① 《何尔康到平 美政治学专家 在清华北大平大讲学》，《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5月8日。

② 《何尔康竟日爬山》，《汉口舆论汇刊》1935年第17期；《何尔康到平 美政治学专家 在清华北大平大讲学》，《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5月8日。

③ 《何尔康教授公开演讲 明晚八时开始》，《国立中央大学日刊》第1382期，1935年，第2309页。

④ 《何尔康教授开始授课》，《国立中央大学日刊》第1379期，1935年，第2297页。

⑤ Holcombe, Arthur 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hase in the Regeneration of a World Pow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神，以蒋介石来代表中国的尚武精神，以冯玉祥来代表基督精神，以鲍罗宁来代表布尔什维克精神。尽管不一定准确，但视角很独特。^①

何尔康教授不仅对中国革命有专门的研究，而且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评价甚高。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对中国做了如下评价：“壮丽之国家，聪秀之人民，与灿烂之前路。”^② 1935年，他在《重游中国的感想》一文中说：我1928年来了一次，这次再来，我看到中国在这7年间的发展日新月异，让我感到非常的欢欣鼓舞。^③

1935年5月15日，何尔康教授在北平大学法学院演讲时，对中国革命和法国、俄国的革命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中国的革命可能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最稳妥最安全的。为什么呢？他分析了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受教育的国民，他认为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时，国民教育程度很低，对于革命以后的发展非常不利，但是，中国的国民素质非常高。第二是中国有一个过渡阶段——训政，其他国家都没有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独特作用是国民教育，这是中国国民素质较高的基础。第三是中国有一整套“条理分明”的革命程序，这对于未来中国政治的发展非常有利，“尤为各国学者所钦佩”。^④

① Holcombe, Arthur N.,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Lowell Institute Lectures*, New York: A. A. Knopf, 1930.

② 《何尔康到平 美政治学专家 在清华北大平大讲学》，《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5月8日。

③ 何尔康：《重游中国的感想》，《中央周报》第362期，1935年，第44—47页。

④ 《何尔康演讲 建造近代国家》，《大公报》（天津版）1935年5月16日。